

文/欧阳烈丹

1985年8月15日,醴陵撤县设市,自此气象日新。但繁华从来不是一夜降临的。两千多年不更名,近两千年不搬家,醴陵守住的,比名字和城址更多。

究竟是城址塑造了城市的性格,还是城市的性格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拣选了这片土地?不如,我们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,去寻那个答案。



醴陵古桥芳洲。

只见醴陵城,不识醴陵侯

发源于江西的渚江,自罗霄群山奔涌而出,在湘东丘陵间弯出一个U形弧线,微微收拢“手臂”,把村庄轻轻拥入怀中。

这里是板杉镇(原转步乡)古城村,距离醴陵城不过七八公里。村庄位于渚江北岸的半岛——中三洲上。1986年文物普查发现,这里系西汉侯城和东汉早期县城遗址。

西汉高后四年(前184),长沙国相“越”,因战功被封为醴陵侯。《史记》记载了这一事件。虽然“越”不久因罪失爵,史册上却因此留下了醴陵的名字。从“越”封侯开始,距今已2210年。

醴陵,早早便被纳入国家叙事,历史的重量早已嵌入名字中,直至今日,它依然在为此座城市背书。

东汉初年,醴陵县设立,隶属长沙郡。最初的县治便以西汉侯城为基础。今天,我们站在渚水河畔回望,这座曾经的县治,地势低洼,想必当年屡遭水患困扰。加之空间有些逼仄,人口渐增之后,城池难堪重负。如此看来,后来县治的迁移,便也在情理之中。

至于迁移的确切时间,学界众说纷纭。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彭雪开推测,这一迁移,应发生在公元56年至124年之间。此后,醴陵城址落定于今城区姜岭东麓的平岗之上,完成了历史上唯一一次城址的迁移。

1996年,长沙走马楼的古井窖中,出土了一批沉睡1700多年的简牍。考古人员清理时,在多枚简牍中,辨认出“醴陵侯”三字。

三国东吴,丞相顾雍被封为醴陵侯。这位端居建业朝堂的重臣,因受爵与千里之外的醴陵有了牵连。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中,未见顾雍之名,只记录下醴陵普通吏民的生计与生活,证明醴陵为长沙郡下辖实县,基层行政运转正常。

当年,那些被醴陵供养的侯爷们,可能终其一生都未曾亲临这片土地,却在不经意间,影响了这座城市行政框架的构建。看似平常的治理之事,没有金戈铁马的轰轰烈烈,却比任何一场战争都能更深刻地决定一座城市未来能走多远。

2000多年没改过名
湘东这座小城有多“固执”

一座小城,如何守住地名2000多年

古人选址建城,讲究审时度势。迁址后的醴陵城,坐落在渚江东岸,姜岭东麓的一片平岗之上。渚江,既是天然的护城河,能防御外敌,又解决了城中用水和物资运输的问题。姜岭为低缓丘陵,平岗地形既不易受洪涝侵扰,又适宜人口居住。据民国《醴陵县志》记载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醴陵没有城墙,完全依靠山川地形来防御外敌。战时甚至会把桥也作为防御手段:“县河深且广,不易架桥……且因县治无城,一有军事,往往断桥以守。”

正是这种地理带来的安全感,让醴陵在历史上的动荡中得以存续。此后近两千年,城市始终扎根在这片河谷台地之上,再也没有搬家。除了隋代被裁撤并入长沙县,元代曾两次短暂升格为州外,醴陵一直保持着县的建制。直到1985年醴陵撤县设市,才翻开新的一页。

在中国历史上,绝大多数城市都几易其名。改一次名,便意味着一次王朝更替,意味着权力对记忆的覆盖。但醴陵从未改过名字。这不是偶然。一座城市能守住自己的名字,往往是因为它守住了自己的地位。先天优越的地理,是最根本的实力。

醴陵的地形自成一格:东北部与西南部山区夹峙相对,各自向中部呈阶梯状倾斜,最终在腹地汇聚成一片河谷盆地。丰富的地貌赋予这座城市以发展弹性——山地、丘陵与盆地交织,构建出一个立体而自洽的生态系统,各类要素在此通过优化配置而实现互补。山区蕴藏优质的瓷土资源,使醴陵成为窑火千年不熄的“瓷都”;河谷盆地则宜种植水稻,孕育出深厚的稻作农业。陶瓷产业与稻作农业,两个看似平常的变量,千百年来如双轮驱动,持续托举起醴陵的成长,堪称这座城市发展的“超级底牌”。

如果说地貌是骨架,那水就是命脉。从地图上看,渚江不仅是一条河,更像一根柔韧的

线,一头牵住江西,一头连着长沙,在古代是名副其实的航运咽喉。南宋诗人范成大途经此地,留下“渚水桥边县”之句,足见渚江之于醴陵,自古便是命脉所系。它自东向西横切盆地,水系呈树枝状分布,输送着物资、技术、文化乃至新的生活方式。一座城市的幸运,不仅是拥有一条河,更是懂得如何借水为舟,驶向远方。时至今日,渚江依旧缓缓流淌,把外面的世界带进醴陵,也让醴陵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醴陵的地理呈半封闭性,山川围合,构成一道防御性缓冲带,成为兵家必争之地,素有“湘东门户”“吴楚咽喉”之称。守住醴陵,就守住长沙,守住长沙,就守住了湖南。尤其当威胁来自东方时,若欲保全湖南,必先牢牢将醴陵攥在手中。

五代时期,这一观点更是刻进了马楚政权的治理逻辑。彼时,湖南由马楚统治,开国君主马殷,本是河南木匠,醴陵成为他“发迹之地”,他从这里走向长沙,成为一国之君。占据湖南后,东境杨吴和后来的南唐始终是最大威胁。为防御东敌,马殷特在醴陵设立五道关卡,以此为藩屏,马楚得以维持四十四年国祚。马楚之亡,也系于醴陵。马殷死后,诸子争位,陷入“五马争槽”内乱,马希崇竟引南唐为援,南唐大军进入醴陵,旋即兵临长沙,马楚遂覆。

醴陵,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仅是一座城,还是整个湘东的地缘枢纽——守得住,又出得去,且提供稳定的物质根基,保有应对危机的空间韧性。这,才是一座城不改名、不搬家的真正底气。

醴陵城址地名不变,仿佛一盏永远亮着的灯,文脉因此不断,时间因此贯通,最终沉淀为城市的精神底色,一代代人口耳相传,城市便有了方向。



渚江书院。



醴陵门。

经世致用,醴陵的人文底色

渚江西岸的青云山,今醴陵一中所在地,宋代时坐落着学宫和文庙。南宋乾道三年(1167),一个人向这里走来——三十八岁的朱熹,正赶往长沙与张栻论学,途经醴陵短暂停留,并在学宫开讲。那时他尚未达到声望顶峰,但理学思想已经成熟。二十多年后,1194年,朱熹知潭州,赴任途中再经醴陵并讲学。如果没有朱熹,醴陵依然会给思想留下一席之地,却未必能在中国思想史上落下那浓重的一笔。

朱熹把文脉种在了这里,醴陵也把他的名字刻进了城市。因为朱熹等理学大师在醴陵的学术活动,催生了一场本地思想的井喷。

西山渚江书院旁,有一座宋名臣祠,清代光绪年间所建,供奉的是南宋醴陵籍名臣吴猎、皮龙荣和杨大异。吴猎先后师从张栻、朱熹,是理学大家。皮龙荣与杨大异,虽非朱熹嫡传,却深受湖湘理学经世致用的熏染,始终怀抱济世之志。

1276年,元军兵临潭州,知州李芾死守不降。参议杨霆,醴陵人,率军巷战到最后一刻,城破,投水殉国。近现代以来,无数醴陵青年走出故土,奔赴沙场,成就了醴陵名将辈出的历史景观。

一座城市真正的人文底色,从不在于故居几处、牌坊几座,而在于一代代人能否共享精神世界,又能否持续发生新的思想、新的学问。

渚江书院大门外,有一座青砖浮雕墙,镌刻着书院走出的近现代英才,文俊铎的名字赫然在列。如果说熊希龄是振兴醴陵近现代瓷业的高层推动者,文俊铎就是落地执行者。1905年,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创办,培养了大批瓷业人才。湖南大学教授李建毛曾言,醴陵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,远不止釉下五彩的技术突破,更在于一场系统性产业转型——从作坊制转向近代公司制,从手工拉坯转向机器制作,从师徒相授转向学校教育,将中国制瓷业推入了近代。

有人留下制度,有人留下思想,有人留下精神,甚至留下一座桥,后来的人便沿着这些根基,一点点往前走。

渚江桥,南宋绍兴末年始建。此后七百多年,到清末为止,七次毁于火,十四次毁于水,醴陵人便一次次把它重新立起来。一部醴陵县志,几乎是一部渚江桥修建史——元代修了一次,明代修了七次,清代修了十三次。今天的石桥,为民国时期修建,由全城乡绅百姓合力捐资,并非官府拨款。桥面已被无数脚步磨得温润,代表着一座城百折不挠的民心。

暮色漫过渚江,一江两岸的灯火次第亮起。人影绰绰,流光溢彩。城市愈发熙攘,也愈发年轻。但醴陵还是那个醴陵,那种不疾不徐的节奏,是两千年的日升月落养出来的。它从不抗拒新生,只是它带着旧时光的余温,一步步走向新的日子。

不变需要底气,改变需要勇气。一座两千年不搬家、不改名的城,才更知道自己站在哪里,也更清楚该去往何方。这样的笃定,这样的“固执”,也是一种伟大。